

# 语篇跨文化对比的问题分析

许力生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学与运用语言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越来越多地从句子扩展到语篇, 近些年来跨文化的语篇对比有了很大的发展。语篇对比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分析和对比句子及其他语言单位的方法与路径来分析和对比。相比之下, 语篇更多地受制于其产生和使用的语境, 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由语言系统的差异所造成的, 也基本不反映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 尽管语篇的具体构成状况与所用语言的特点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 语篇; 语境; 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4-0117-07

对语篇的系统研究, 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这说明语言学家的视野正在拓展。然而, 我们注意到, 虽然研究的对象变了, 研究的基本路径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在许多时候, 语篇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被当成句子的放大和延伸, 在研究中继续套用分析和对比句子的方法。

事实上, 语篇不仅是比句子更大的语言单位(a unit of language above sentence), 而且是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 in use)。语篇是在语境中、在特定社会文化中的语言运用。我们可以像分析句子那样去分析语篇的组织构造, 但这种分析绝对不能脱离语篇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语篇形成的规律、语篇样式的特征, 与社会文化语境的方方面面有着十分密切但又不那么显著的联系。目前, 语篇对比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 而且大多与对语境的忽视有关。本文将探讨其中一些问题, 希望能对改善和推动语篇的跨文化对比研究有所帮助。

## 一、过度概括和先入为主的问题

语篇(尤其是书面语篇)在其组织结构上很有讲究, 在这个方面, 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对语篇构建模式进行跨文化的分析,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Kaplan 开始, 就一直是语篇对比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Kaplan[1]根据他所收集的外国学生用英语写的作文, 对其文章中段落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得出了五种不同的段落发展类型, 并分别与具有不同母语背景的五组学生相关联。由此, 他认为, 英语的语篇组织结构具有直线发展的特点, 闪族语语篇的发展呈平行型, 包括汉语在内的

[收稿日期] 2003-11-0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许力生(1950-), 男, 重庆人,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研究。

东方语言的行文方式则往往是螺旋型,而罗曼语系的语言(如法语、西班牙语等)和俄语则有些相似,其语篇模式多呈“曲折”型,只是俄语在转题和分岔时似乎更为自由。

Kaplan 对不同语言的语篇构建进行定型固然简明扼要,生动形象,但也如后来被人批评的那样,存在严重的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问题。比如,Kaplan 将汉语语段发展模式视为螺旋式,虽有不少研究的结果不同程度地支持了他的观点,但也不乏相反的意见和例证。如 Mohan 和 Lo[2] 考察了现代汉语和英语的情况,认为汉语与英语的写作其实并无显著差异,同样推崇直接表达的方式。许力生和李广才[3]曾做过汉英语篇的对比分析,发现在当代汉语语篇中,直线模式和非直线(螺旋)模式都不乏其例,二者似乎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究竟谁占主导地位还难下结论。

之所以会有这样相互矛盾的情况,跟研究中的过度概括倾向不无关系。语篇对比往往简单地将语篇和所使用的语言等同起来,将语篇对比的基础建立在语言的不同之上,倾向于认为一种语言中必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主流语篇模式,却没有对语篇之间,尤其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不同语篇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给予足够重视。

同样,对于 Kaplan 将英语看作直线发展模式的观点,有些学者(如 Matalene[4])也提出批评,认为其带有较浓厚的先入为主的“英语中心主义”倾向。实际上,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可能也会认为自己母语的篇章发展模式是直线型的。例如,对英法医学论文语篇结构的对比分析显示,在描述病情发展过程时,英语论文一般会按时间顺序描述几种病情症状的发展变化,而法语论文则倾向于将几种症状分别从头到尾描述,并且可能在描述某个症状发展过程时顺带提出对其发展趋势的推测。说法语的人会认为这样做最自然,但在使用英语的人看来,这样的描述是曲折型的,加进了一些不必要的插曲。可是,英语论文的描述在法国人看来也不是直线型的,因为几种症状同时交叉描述,犹如几股绳索扭在一起,可能让不习惯这种方式的人难以理清头绪。[5](pp.47-221)

针对 Kaplan 的观点, Young [6][7] 经过调查研究后指出,西方学者有时并没有真正理解东方人的思辨方式。英美人一般是先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然后再加以论证,遵循的是“论点往何处去”(*where the argument is going*)的方式;而中国人常常是先摆事实、讲理由,然后再得出结论,遵循的是“论点从何处来”(*where the argument is coming from*)的方式。英美人时常认为中国人讲话不着边际、不可理喻(*inscrutable*),其实是他们不了解东方人的思辨方式。

Scollon.R 和 Scollon.S [8](pp.74-80) 则认为,汉英语篇之间之所以有差异,主要是因为它们分别倾向于采用归纳式的和演绎式的话语模式。在归纳模式中,说话者在得出某个特定结论之前要充分说明多方面的原因,并通过详述论据来试探听话者对话题的潜在接受程度,直到认为合适的时候方引入话题;而在演绎模式中,话题是在说话之初就引入的,以此来使后面的一系列支撑性论据显现出清晰的关联性。[8] 而 Hinds [9](pp.89-90) 却提出,的确存在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东方写作方式,但这既不是归纳式的,也不是演绎式的,而是他称之为的“半归纳式”(*quasi-inductive*),在这种写作方式中,话题的引出常常隐藏在语段之中的某处,而不是出现在语段开头或结尾处。[8]

无论怎样,究竟何为直线发展模式,何为非直线发展模式,其实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将它们分别对应于特定语言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而且,Kaplan 的母语是英语,他对其他语言的概括仅以外国学生用英文写成的习作为材料,难免会出现偏颇与误解。如李战子[10](p.372)所指出的,当年 Kaplan 论文并非完全客观地指出语言之间的差异,而是隐含着不少带有相当片面性的价值判断。

然而,就是这样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典型,却常常成了许多语篇对比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尽管现在在语料选择和分析方法上比 Kaplan 那时有了更大的改进,但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却依然免不了有过度概括和先入为主的嫌疑。

## 二、语篇与语言的关联问题

现在的语篇对比研究一般都赞同 Kaplan 的观点,认为语篇的构建模式并非普遍一致的,而是具有语言与文化的特殊性,随语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也顺理成章地认为语篇与语篇使用的语言及其相关文化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固的对应关系。

可是,语篇状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对此产生怀疑。Scollon.R 和 Scollon.S [8] 在讨论归纳式和推理演绎式话语模式时就指出:“……这两种话语模式没有天生固定的西方或亚洲模式之说,因为据我们所知,两种模式在所有的社会都有使用。”[8](p.75)换句话说,语篇模式与特定语言或文化(即通常说的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等等)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联系。比如,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并非一直都推崇话题先行的模式。在中世纪,比较常用的表达模式是极具归纳性的,一个人会先提及所有可能与自己观点对立的人的意见,然后陈述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直到最后才说出自己的结论。而话题先行的演绎性模式只是在启蒙运动以后,随着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后才为人们所认同,在政治、商务、教育、学术研究等许多领域被当做最自然的交际方式。

我们知道, Hinds[11](pp.142–143)提出过用作者责任型语言和读者责任型语言的区分来解释语篇对比中发现的差异。他认为,讨论语篇构建,必须考虑读者与作者的相关责任问题(relative reader/writer responsibility),即读者与作者在语篇交际过程中对意义的传达和理解各负多少责任的问题。按此区分,Hinds 认为,英语是作者责任型,日语是读者责任型,而汉语正处于从读者责任型朝着作者责任型方向变化的过渡阶段。

像这样拿语言的所谓不同来解释语篇的不同的做法,尽管已比较通行,其实是很成问题的。语篇构建究竟采用什么方式和类型,主要与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而不是与特定语言有关,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汉语正在从读者责任型过渡到作者责任型。如果说确有 Hinds 所认,为的作者责任型和读者责任型的语言区分,原因恐怕也不在语言本身的差别,而是与 Hall[12]所说的高语境(high-context)交际文化与低语境(low-context)交际文化的差异分不开的。在高语境交际文化中,意义的传达更多地依靠语境和读者的“意会”,作者不必把什么都说出来,说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 Kaplan 阅读古汉语文章时会感到吃惊,认为作者没有尽到把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说明白的责任。而在低语境交际文化中,意义主要由语码来负载,作者自然要承担较多的责任。如果说今天的汉语真的正在从读者责任型过渡到作者责任型,那只能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高语境交际文化向低语境交际文化过渡,而不是汉语本身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同样,今天的汉语语篇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像 Kaplan [13](p.19)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八股文”的模式,那要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文化观念上与“八股文”盛行时代的中国社会有多少相同之处。与其说“八股文”的模式与汉语语言有什么根本联系,不如说它与特定的文化观念及社会现实紧密相关。从语法上看,一种语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可能没有什么改变,但只要文化上有改变,这种语言的实际使用方式就一定会有变化。

从根本上说,语篇的构建方式与所使用的语言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同一语篇模式在不同语言中的实现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决定语篇构建方式的是文化,是基本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会构建出什么样的语篇。但是,以东方、西方或不同民族为基本单位所划分的文化群体过于庞大,很难避免过度概括的问题,而每种文化的内部都会存在许多差异,有必要进行更加具体、细致的分析。

Scollon.R 和 Scollon.S[8]提出的话语分析法对语篇的跨文化对比不乏启示意义。他们主张不

以语言系统而以话语系统(discourse systems)为基本单位来分析文化差异,认为每种话语系统都有各自的文化观念,有一套受制于其文化观念的话语模式,而一些话语系统会跨越民族与地域的界限,在不同社会中都能找到。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单纯以地域、国家、民族或语言来划分文化,而应更多地考虑每个地区、国家、民族或语言内部话语系统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地区、国家、民族或语言之间某些话语系统的共享状况。

语言对比到了语篇层次,原有的以民族语言作为其对比基础的做法恐怕已经很难成立。如果还要进一步将语言与特定的文化一一对应地联系起来,就更成问题了。当对比进入到语篇、语用这样的层次,即从比较两种语言的内部变成了比较两种语言的外部或者说是内部与外部的联系,情况就复杂多了。实际上,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语篇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明显大于用同一语言写成的语篇之间的相似之处。某些同一语言语篇之间的差异也不一定会小于与另外一种语言语篇之间的差异。跟不同人群之间相对隔绝和分离的过去不同,在当今世界,文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话语方式(即语言的运用)上,而不是在语言本身。因此,语篇层面的跨文化对比应当以不同的话语系统而不是以语言系统为基础。

### 三、对比研究中的语境问题

语篇构建模式实际上是人们在特定文化的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完成其交际任务的习惯性方式和程序。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制造、使用的语篇会有所不同,因为不同语篇建构的是不同的个人经验和社会文化现实。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语篇看做独立存在的分析对象,忘记了它们实际上是存在于特定的语境之中的。当我们选取语料做对比分析时,实际上就已经把语篇从其存在的语境中抽取了出来,作者、读者、时间、场景、写作目的、与其他语篇的关联等等影响语篇构建和面貌的因素,都很少进入我们视野,语篇成了孤零零的、可以单独进行剖析的客观存在。

应当认识到,语篇之间的差异远远不只是与所使用的语言本身有关。语言系统的内部构造差异是多层面的,不会不影响实际完成的语篇的面貌。然而,具体语篇产生和使用的语境(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是不同的,具体语篇的制造者(作者)和语篇的实际和潜在的消费者(读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语篇各自的特征与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的不同所导致的,任何语境上的变化都有可能对语篇的构建方式和实际面貌产生影响。

在语篇对比研究中,可以直接看到的、易于进行统计和分析的只是语篇中的显性特征,这让我们很容易忽视或忘记语篇内隐而不显、但却对语篇构建十分重要的语境因素。

以语篇研究中讨论较多的衔接与连贯为例。自 Halliday 和 Hasan[14]提出衔接理论以来,语篇对比几乎都要涉及衔接方面的对比。尽管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以英语语篇研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论述的也只是替代、省略、连接、词汇衔接等几种较为明显的衔接类型,后来的衔接对比大多仍然以其为主要依据去描写和解释不同语言语篇之间的异同。而语篇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连贯,实际上对语境有很大的依赖性。有些学者(如胡壮麟[15])提出语篇连贯涉及多层次,并认为社会符号层因素对语篇连贯有重要作用。我们知道,表面上看似不衔接或毫无衔接特征的语篇仍可依靠特定的语境而形成自身的连贯。语篇通常是对特定情形和事态而构建的,有其特定的读者对象和特定的交际目的。抛开这些,孤立地分析语篇本身,只考察语篇中的显性特征,这样的分析能有多大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呢?

有必要指出的是,不同文化对语篇连贯会有不同的期待与理解。语篇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为实现连贯而使用的衔接手段和方式上,同时也可能存在对连贯的期待与理解上。怎样才算连

贯,连贯程度如何,不同文化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认识。

例如,Dissanayake[16](p.40)曾指出,印度文化就有着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思维逻辑,印度的逻辑不主张相互排斥的二元对立,不认为一个事物非此即彼,而是承认价值的相对性,认为每个事物尽管有其自己的真实,但其真实是相对的,有限制的,只是众多变化不定的经验形式中的一个而已。超越经验层面,一个事物不是非此即彼,而是非此非彼或者即此即彼。即使在经验层面,印度人也不愿意将彼与此视为相互排斥的对立物,而倾向于将它们视为由一系列中间地带及过程相联系,两者之间没有可以截然区分的边界。印度与西方在逻辑上的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自语篇构建上的特有方式。同样,在对比研究中的语篇类型问题上,语境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现在都强调以语篇类型作为对比研究中可比性的基础,而且类型的区分也日趋细化,如学术写作中区分了研究论文和科研资助申请,新闻写作中区分了新闻报道和社论,商务函件写作中区分了书信与传真,等等。毫无疑问,这对于克服语篇对比中的简约化倾向是有好处的。然而,目前对语篇类型的划分本身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在语言学界,一般认为语篇类型是人们用语篇来做事而逐渐形成的典型化社会行为,社会交际目的是界定和区分语篇类型的最主要因素。然而,近年来有关研究显示,语篇类型的情况比以往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仅用社会交际目的来划分语篇类型是不够的,语篇类型的形式结构也远不像有些学者所想的那么容易预测。对语篇类型的划分需要考虑多种因素,也就是说,语篇类型是“多面”(multi-faced)的,不能只看其中一个维度。而且,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常见的“语篇类型侵殖”(genre colonization)现象也冲击着原有的语篇类型划分,使准确判定语篇的类型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研究语篇类型的原型性(prototypicality)和共性的同时,对于语篇类型的多样性、灵活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都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例如,不同的语篇类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其中有的是超越特定语言的,有的则与特定语言相关。因此,选择不同的语篇类型进行跨语言对比,得到的分析结果很可能大相径庭,而以这样的分析结果去进一步推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如Kaplan等曾经做过的那样),似乎就更成问题了。比如,在使用不同语言写成的学术文章中,自然科学论文可能会呈现较多的跨语言共性,而人文学术论文的特性则有可能与特定语言关系更密切。忽视语篇类型之间的差异,即使所对比的语篇是属于人们通常认为的同一类型,对比的结果和结论反映的却有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很难将它进一步推广到更大范围。

现在更加需要注意的是隐藏在可比性之下的那些影响对比研究的因素。表面上的可比性有时候会掩盖一些重要的文化差异。有多少语篇类型,有些什么样的语篇类型,这主要取决于语篇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取决于其社会构造的状况,包括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化程度。不同语言中看似相同的语篇类型,其社会文化功能也许不完全相同,在各自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也可能不一样。

Gumperz[17](pp.376–377)曾指出,随着生产方式的急剧变化和人口移动的加速,在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中,多样性已成为普遍现实,民族文化早已不是同质的了,民族语言的界限也越来越多地被逾越。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之间可能会有深刻的文化差异,而说不同语言的人之间有可能共享同一种文化。<sup>[8]</sup>这种情况的出现对跨文化语篇对比分析提出了新的挑战。

当对比分析从句子层面延伸到语篇层面时,语言运用与文化的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更加复杂。语篇不是句子的放大和延伸,其情况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套用分析和对比句子及其他语言单位的方法与路径来分析和对比语篇。因为,相比之下,语篇更多地受制于其产生和使用的语境,而且语篇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由语言系统的差异所造成的,语篇的构建方式与所使用的语言没有

必然的联系。因此,目前语篇对比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是值得质疑的。

语篇的跨文化对比研究需要突破其原有研究视野的局限,超越对语言和文化传统定型,更多地把语篇放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增加对比过程中跨语言与跨文化的互为参照。应该说,这是语篇研究的发展方向,更是以研究使用中的语言为主要任务的语言学家的责任。

### [参 考 文 献]

- [1] R. B. Kaplan.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J]. *Language Learning*, 1966, (16): 1-20.
- [2] B. A. Mohan, W. A. Lo. Academic writing and Chinese students: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 factors [J]. *TESOL Quarterly*, 1985, (19/3): 515-534.
- [3] 许力生,李广才.汉英论说文语篇的修辞模式对比[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2(5):56-64.
- [4] C. Matalene. Contrastive rhetoric: an American writing teacher in China [J]. *College English*, 1985, (47/8): 789-808.
- [5]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6] L. W. L. Young. Inscrutability revisited [A]. J. Gumperz, ed.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C]. New York: CUP, 1982, 72-84.
- [7] L. W. L. Young. Crosstalk and Culture in Sino-American Communication [M]. Cambridge: CUP, 1994.
- [8] R. Scollon, S. Scoll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M].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 [9] J. Hinds. Inductive, deductive, quasi-inductive: expository writing in Japanese, Korean, Chinese, and Thai [A]. U. Connor, A. M. Johns, eds. *Coherence in Writing: Research and Pedagogical Perspective* [C]. Alexandria, VA: TESOL, 1990. 87-110.
- [10] 李战子. Biased discourse in contrastive rhetoric study [A].胡文仲.跨文化交际面面观[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70-389.
- [11] J. Hinds. Reader versus writer responsibility: a new typology [A]. U. Connor, R. B. Kaplan, eds. *Writing Across Languages* [C].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87. 141-152.
- [12] E. T. Hall. *Beyond Culture* [M].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 [13] R. B. Kaplan. *The Anatomy of Rhetoric: Prolegomena to a Functional Theory of Rhetoric* [M]. Philadelphia: Center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972.
- [14] M. A. K. Halliday, R.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
- [15] 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 [16] W. Dissanayake. Foundations of Indian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phenomenology [A]. W. Dissanayake, ed.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Asian Perspective* [C]. 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 1988. 39-52.
- [17] J. J. Gumperz.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relativity of conversational inference [A]. J. J. Gumperz, S. C. Levinson.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 Cambridge: CUP, 1996. 374-405.

## On Cross-cultural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XU Li-sheng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 Applied Linguist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s discourse, instead of sentence,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the basic unit in linguistic studies, cross-cultural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has greatly develop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some problems have arisen in the research and they should be seriously addressed if cross-cultural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is hoped to make any mor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 years to come.

First, there exists a strong tendency to oversimplify the discourse structures found in texts under investigation. While differences between texts of various languages are invariably emphasized, differences between texts within the same language are generally ignored. As a matter of fact, it has been indicated by not a few researche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discourse patterns can invariably be found in most of the languages investigated so far in contrastive analysis. Kaplan's hypothesis, which is now accused of Anglo-centrism, has often been take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texts and descriptions of discourse patterns across languages. As a result, researchers may not be just pointing out differences but making value judgments, in which bias is almost inevitable.

Second, cross-cultural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tends to underestimate 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ities of discours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which linguistic boundaries are changing and becoming less sharply marked, 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no longer co-extensive. Nowadays,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can hardly be maintained between discourse and language, but many researches are still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national languages and try to explain the discourse features found in the text studied by simply relating them to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 text is written.

Third, texts have often been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o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were originally produced and interpreted. In recent years, though contextual factors such as genre are given more attention in today's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they are usually considered as static and programmatic. Many researchers fail to recognize that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a text is,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ed not by the language in which it is actually written, but by the particular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 text is produced and used.

Since culture is a too evasive concept that tends to overgeneralize, it is suggested that cross-cultural contrastive analysis should base itself on discourse systems instead of national languages, for discourse system is actually where culture is constructed and reproduced through the use of language. Therefore a theory of discourse system is necessary for us to better describe, analyze and account for the struc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differences found to be existing between texts. Such a theory may help us discover what has not been noticed before and review wha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known in a new perspective. More importantly, some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seem to have been well-established in the research can be questioned, which will help to pave the way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Finally, it is concluded that discourse is not just a unit larger than sentence bu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many aspects. In reality, discourse is far more complicated and context-dependent than sentence in its production and use. What actually distinguish discourses are not necessarily what distinguish languages though they are, not directly as is usually assumed,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certain aspects. Therefore, discourses should not be approached and contrasted in the same way as sentences are and cultur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more local phenomena when discourse differences are viewed and explained as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 words:** discourse; context; contrastive analysis